

目 录

从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到黄石市印刷厂	肖少平 余启国 卢本福编写 (1)
我的历史回忆	尹楠亭 (17)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片断回忆	沈里中 (24)
东阿被俘脱险记	李 夫 (41)
我对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护厂斗争的回忆	夏宗铸 (50)
国民党黄石港邮政局回忆	杨开国 (63)
金牛镇商会今昔谈	金南谷 (81)
辛亥革命老人潘康时在沈家营码头	马景源、张承良 (91)
红三军团攻占港窑湖	贺峰编 (94)
大冶史话 (中)	众志成 (99)
大冶民间戏曲、曲艺简介	竹笛、李英、朱未 (119)
附：征稿索引	小 路 (124)

从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 到黄石市印刷厂

肖少平 余启国 卢本福编写

黄石市印刷厂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厂，初创时期，它是李先念同志领导下的新四军五师在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印钞厂，为粉碎当时敌人的经济封锁，它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敌人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它秘密地担负着豫鄂边区印制边币的任务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它来到黄石，继续前进，在建设黄石的历史上又写下了光荣的一页。黄石市印刷厂的厂史不仅是当前研究历史的宝贵史料，而且也是该厂革命的传家宝。在振兴黄石经济的新形势下，它将在全厂职工中产生积极的不可估量的精神作用。

一、初 创 时 期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武汉以后，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诱降，对抗日根据地却采取全面的“扫荡”政策。与此同时他们还互相勾结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经济

封锁，企图一举消灭人民抗日力量。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于一九四〇年，派李先念、陈少敏同志来豫南、鄂中、鄂东、鄂南对各抗日游击武装力量进行整编，先后组建豫鄂边区挺进纵队、挺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五师，建起了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

新四军五师在豫鄂边区迅速壮大，遭到了敌人的极端仇视。日寇为了一口吞掉这股革命力量，在军事上对新五师四面夹击，经济上进一步封锁。当时日寇的日钞，汪记储备券和蒋记法币在我根据地市场上泛滥成灾，使我们生产不能发展，财政经济出现空前困难的局面。为了狠狠打击敌人的经济封锁，满足边区人民的要求，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当时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的陈少敏同志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的边区军政代表会上提出要建立银行，筹建印钞厂、发行边币来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就是根据这一斗争需要而诞生的。

五师和边区党委对筹建印钞厂十分重视，由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兼财政处处长刘子厚同志（原河北省委书记）亲自抓。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当时任五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同志选派了曾做过石印、刻字、熟悉印刷工艺的挺进报总编辑齐光同志（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负责印钞厂的组建工作。边区党委还选派了得力干部冯森同志（现名冯玉亭，离休老干部）以及齐光同志推荐的当时任挺进纵队政治部总务科长李琢章同志（原武汉一轻局副局长）参予印钞厂的组建工作。

当时敌军对我实行严密封锁，在技术人员、机器设备、原材料全无的情况下，筹建印钞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

由于党委的重视，齐光、冯森、李琢章同志的决心很大。李琢章曾与齐光一起在河南确山竹沟搞过印刷，懂得业务。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于四一年四月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始正式组建印钞厂。

厂址设在天汉湖区刁汊湖边上的杨业背新陈埭（这个地方是湖区、交通不方便，当时敌人对这个地方控制还不力，这样就有利于我方抗日活动）。秘密成立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为了对外保密，公开的名称是“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干部休养所”。

开始仅一部石印机与一名从“七七”报调来的石印工人，因而工作进展不大。四一年四月党组织派人到汉口用高薪聘请印制钞票的技术工人参加印钞厂工作。当时动员了在汉口做过石印制版的技术工人李有广同志（现名李向明，沙市石油批发站经理），又通过李有广邀请了徐荣臣（武汉硚口印刷厂，已退休）程勋尧（洪湖县印刷厂，已退休）两名做石印的工人参加。在动员这些工人参加印钞厂工作时，党派去的同志告诉他们说：“大后方要办印钞厂，需请技术比较好的工人参加，待遇优厚，每月三十块银元的工资”。这些工人早就不愿做亡国奴，都很乐意到大后方去。就这样他们每人领了两个月的安家费，由我党派去的交通员带领，送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到了汉川杨业背新陈埭一看，这些工人都觉得很奇怪。这里哪有印刷厂呀？既无厂房又无机器设备，眼前是湖水茫茫，芦苇丛生的荒芜景象。住的是茅草棚，吃饭时仅一碗菜。这些工人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对眼前一切都感到陌生，很不习惯。

齐光、李琢章、冯森等领导同志，看出大家刚从武汉大城市来，一时难以适应这种艰苦生活的心情。针对这些同志的思想状况，采取开欢迎会，给大家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讲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英勇杀敌的英勇事迹等办法，提高这些同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使这些同志认清了形势，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道理。这些工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亲切的讲话，从来没有受过这么深刻的阶级和爱国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工人们看到这些领导同志当官不象官，说话和气，把工人当亲兄弟看待，与工人同甘苦，共患难，一心为抗日，大家很受感动。因而他们认识到解放区是光明的，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这样，大家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步安心了工作，决心要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这时的印钞厂只有一部石印机，条件很差。冯森等同志精心设计了一个两角钱的票面，由当时任文工团团长的唐亥同志（现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在票面上画了个妇女纺线的图案，冯森则在版面上写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等文字，齐光同志刻了正、副行长的章子。再由制版工人李向明照描在药水纸上，拼制了花边、花纹、落制成印版后即进行印刷。这个票面在边区市场流通后，由于当时印钞设备简陋，纸张质量低劣，印出的钞票质量很差又不耐用。为此，组织上先后派李向明和冯森到天门皂市和胡家场通过商人的关系，购买了两部石印机和一部三号元盘机（花了百余块银元）。随后，组织上又派冯森、李向明和刻字工人李兴深入敌占区，在汉口采购了三十多块花纹铜版和一批印钞票的纸（美

制二号纸），油墨等原材料。当时在武昌、汉阳做石印印毛巾图案的李杰同志（原洪湖县林业局局长），他在汉阳索河有两部石印机。通过杨炎青、尹卓的介绍后李杰同志为了支援当时的革命斗争，丢下家庭，放弃个人利益，毅然决定带着机器和工具加入印钞厂，一进厂就自愿不要工资，和大家一样拿供给制。同年七月，在汉口靠卖另工糊口的印刷工人尹竹樵同志（原黄石市印刷厂厂长）、尹楠亭同志（原黄石市印刷厂厂长）兄弟二人在党组织的秘密动员下也参加了印钞厂工作。短短几个月，印钞厂在齐光、冯森、李琢章等主要负责同志和全体工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使印钞厂初具规模，拥有五部石印机，一部元盘机，工人也逐渐增多。当时齐光同志于六月调往五师师部，豫鄂边区政府正式任命冯森同志为督导员（相当于教导员），李琢章为厂长、支部书记，蔡俊为副厂长。

同年八月，正式开始了制版工作。版面是五角，一个牛耕田的图案，小版制好后即投入生产。这时的生产还未完全走向正常，原材料供应也成问题，其中钞票纸和印钞票的好油墨还不容易购买。开始以高价委托应城的商人采购，所购回的纸张都是模造纸，根本不能作印钞纸用。因此，这年冬天，冯森同志亲自出马，带着干部方允和勤杂员小黄到汉阳柏泉乡设立秘密办事处，住在工人柯敏和李兴家乡的邻村彭家大湾，秘密进行采购工作，保证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

二、抗日战争时期

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日寇在进攻全国各解放区的同

时，也开始了对豫鄂边区“蚕食”性的“扫荡”，进攻的目标直指鄂中和鄂东地区。四一年冬，汉川的敌人对天汉湖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日寇放火烧了杨业背街，工厂被迫转移。由于敌人的经常扫荡，至使印钞厂不能正常生产，经常“打游击”。五师和边区党委对印钞厂极为重视和关怀，除及时派人给印钞厂递送情报外，还为印钞厂的转移、疏散作了十分细致的安排。

由于“打游击”是经常的事，组织上就经常教育大家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常备不懈，同时也非常注意保密工作。周围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边币就是在他们身边印出来的。厂里如果购回大批纸张，为了防止敌人扫荡，事先都要选好隐蔽地点，做好防潮和伪装工作，挖洞埋好。车间里只留两三天印钞用纸，需要时在深夜暗中取回。为防止敌人破坏，对机器设备也采取了隐蔽措施。预先挖好土洞或选好塘湖港汊，一旦出现敌情就立即把机器拆开、埋藏或丢进水里。敌人撤退后再将这些机器挖出来或打捞上来，迅速安装恢复生产。

一九四一年底，刘子厚同志来天汉湖区段家湾检查工作，李琢章同志向刘子厚汇报工作。刘子厚同志感到生产速度过慢，边币发行满足不了市场需要，银行也常常因此无票子发行。刘子厚同志对李琢章同志提出要加快印钞速度的意见。根据刘子厚同志的指示，从四二年开始迅速组织印制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票面的边币，同时又采购了两部石印机，印钞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四二年春，印钞厂迁到汉川十大姓。当时因为地方条件的限制，以及疏散隐蔽的关系，工厂分为三处：行政事

务人员住十大姓，一部分技术工人带部分石印机住在黄家台，另一部分技术工人则带着几部石印机住在裴家院子。此时冯森同志亦因工作需要调任行署驻汉办事处主任。工厂由李琢章同志全面负责，没有厂房，就自己动手买来楠竹、芦柴、芦席、稻草等，在两三天内就建成了一座简易厂房，很快开始了印钞生产。这时的工厂人员有三十余人，由于设备、人员技术力量基础开始好转，因此印钞的产、质量都与日俱增，受到了刘子厚同志的好评。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工厂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为了避免目标过大与边币发行量增大的情况，组织上决定采取分散办厂的方法。刘子厚同志亲自物色干部，在印钞一厂的基础上筹建了二、三厂。四二年四、五月，印钞二厂在大悟山成立，由王正道同志（原荆州行政公署副专员）任二厂厂长兼鄂东建行分行行长。由吴友德、张克固同志（现名张苏、原天津轻工局副局长）组建印钞三厂。同年七月李向明调任二厂工务股长，调去二厂的有郑精武（沙洋马良农场党委副书记）、江炳银（原宜昌市交通局局长）、李本端等同志。原有的印钞厂即称为印钞一厂，李琢章同志仍为厂长，副厂长蔡俊，工务股正副股长为尹竹樵、尹楠亭同志。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厂又迁到潜江一个叫李家台的芦苇丛中生产。这个李家台只住有三户人家，当时一厂已有八部石印机，一台元盘机，正副厂长未变动，工务股长仍是尹竹樵、尹楠亭负责石印车间工作，王为春负责用手拖刀切纸，（王原黄石市印刷厂老工人）叶建希负责元盘机打号码的工作。石印工人有：李维龙（原沙洋农场一场场长），雷在中、万钧、方易平、秦金山、聂梓元、王元富、涂汉臣以及

其他人员肖秀凯、操俊（女，李琢章的爱人）等三十余人，此时是工厂发展的兴旺时期，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

印钞厂每个职工进厂都要进行保密教育。一年半的时间里，工厂就搬迁了五次，每次搬迁都要绝对保密。搬迁的交通工具是木船，搬迁前选择好地点，白天将机器拆散，将石版、原材料、半成品收拾整理捆好。天黑后搬上船，半夜到达目的地，尽量做到不让外人看见工厂搬迁。工厂离敌人据点很近，一般只有三五十华里，很容易遭敌伪军突然袭击。组织上规定工厂人员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穿戴，工厂周围每天轮流放便衣哨，严格检查陌生人和外地来的小商小贩。李琢章厂长还严格规定，不准有一张白纸片或书报纸丢在厕所里，这主要是怕敌人察觉以致暴露目标。

在李家台工作了一年多，因考虑时间长了容易暴露，便于四四年元旦迁到荆门彭琢湖。厂址就设在湖中的一个岛上。这个小岛只住有两户人家。当时，工厂掌握了七八条小船，来往交通很方便，而且敌人也不容易发现这个地方。在彭琢湖搞了七八个月后，工厂又迁至潜江返湾湖，仍建厂在湖中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岛上，这时工厂已经有五十多名职工，石印机八部，元盘机一部可以说是印钞一厂的全盛时期。四四年八、九月间，任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的庄果同志（现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到厂检查工作，庄果同志在厂里住了近两个月，在检查工作中庄果同志发现一些技术工人片面强调质量，不敢大胆放手让新工人上机操作，因此，青年工人的力量没有发挥出来，工作进度不快。庄果同志提出：要提高工作效率，就应当使青年工人一面学技术、

保质量，一面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在庄果同志的发动下，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青工很快上机操作，生产效率有较大的提高。印钞工作由原来的一班生产改为两班生产，早上天亮到中午十二点为早班，十二点到天黑为晚班，石印台班日产量由600印增加到800印以上。

四三年三四月间，尹楠亭同志调任印钞三厂工务股长。三厂在黄冈常店后面半里路的一个塆子里，生产一段时间由于形势恶化，全体职工组织参加了其它的抗日活动。

三、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正式签订了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八年抗战结束后，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极力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集团不断将抗战期间龟缩在大后方的精锐部队用美国飞机和船舰运送到解放区周围。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量兵力，向我豫鄂边区进攻。我根据地范围逐步缩小。豫鄂边区印钞厂无法开展正常生产。四五年冬，印钞厂在天门观音湖附近掩埋了部分机器，转移至汉川吕家巷。一九四六年元月印钞一厂在京山曹武区被迫停产，同时经豫鄂边区组织决定：工厂人员机械一律疏散。

疏散时开了动员大会，当时有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很多人不愿走，要坚持革命，同生共死地战斗在一起。他们认为：战斗虽紧张、生活虽艰苦，但是宁愿生活在根据地，却

不愿到蒋管区过受压迫、受奴役的日子。经过组织反复讲形势，决定了每个同志的去向、任务、职业和生活安排，给了路费和“复员证”——将来归队时用以证明个人的身份。

同月，尹竹樵和尹楠亭兄弟俩按组织上的指示，与郑精武、杨维舟（洪湖县建材公司经理）、王为春等同志带了四部石印机和一些纸张、油墨转到武汉。在汉口满春钟台街又找了几个印刷工人，共有七八个人开了一个“新民印字馆”。李琢章亦经组织决定转入武汉做地下工作。

二厂则于四五年八月在庄果同志的率领下，在四望山龚家湾印了一个时期的大票子（伍百元、一仟元未发行）。两个月后，由于形势所迫又回到大悟山。一部分技术工人转到“七七”报社、青工由延安南下的技术工人王慎带领编入豫鄂边区行署警卫连，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机器也拨了一部分给“七七”报社，其余就地埋藏了。

李向明、李杰则由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谢文耀同志的亲自安排，与江炳银、李本端、方易平等同志带着两部石印机和一部三号元盘机也转入武汉，在汉口三义殿开了个“光华长印字馆”。

边区其他单位“疏散”来汉的同志都有各种职业掩护身份。有的开旅馆、有的开饭馆、卖香烟、开水果行、参加被服厂等等。文工团来的同志参加到旧剧团去唱戏。参加到各种职业中去的同志都各自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完成对敌斗争的任务。

当时的新民印字馆实际上就是我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以印刷业务为招牌迷惑敌人。出头露面的老板是尹竹樵，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是李琢章，主要任务是接送往来于我边区

的同志。为这些同志筹办去解放区的衣物，给他们找交通，造假身份证，负责他们的人身安全。当时的新民印字馆为解放区输送了很多革命战争中必需的人材，如：医生、办报人员等。同时，印字馆还配合五师突围，负责把五师突围中的一些同志接转到解放区。其中有五师的一位交通员肖秀凯同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军需处处长）就经常把突围中受困的同志带到印字馆，换成便装，带上印字馆造的假身份证和通行证送往解放区去。

一九四六年底，刘子厚、刘子久、文敏生等同志化装突围到武汉时，会见了李向明。李将在汉的两个地下印字馆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刘子厚同志指示：将新民印字馆与光华长印字馆合并，统一称光华长印字馆，从此于抗日战争期间一分为二的印纱两厂，在解放战争中又合二为一了。

合并后的光华长印字馆地址仍在汉口三义殿，由尹竹樵当老板，地下党的负责人仍是李琢章。在光华长印字馆工作的还有：李向明、尹楠亭、郑精武、李杰、江炳银、杨维舟、王为春、李本端、方易平等同志。光华长印字馆在社会上以公开的印刷业务一方面用以维持本店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定的活动资金。实际上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仍起着地下联络站的作用。仅四六年底就有刘子厚、刘子久、文敏生、王树声等领导同志化装来汉，经印字馆提供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去的。一九四七年夏，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胜利形势。同年八月，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由司令员赵基梅率领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重返中原。已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先念亦随队行动，从此，中原解放区又得恢复。鄂

东、鄂中、江汉等地亦因此相继又恢复了解放区。

四八年春沔阳专区专员张旺午（原湖北省人大副主席）派人来汉通知：光华长印字馆立即去潜江参加印制中州市的工作（之前在江汉军区已有大面额的中州市印刷）。接到通知后尹竹樵、江炳银、郑精武、李本端带着一部分铜版先进入襄南解放区即潜江熊口镇，投入了襄南解放区印钞厂印制中州市的工作。尹竹樵任该厂的厂长，李向明和尹楠亭等人留汉作光华长印字馆的善后工作。

同年四月李琢章在汉被叛徒出卖被捕，李向明与尹楠亭即离汉进入襄南解放区参加了印钞工作。由于当时专区要出襄南日报，派李向明去汉购买平台印刷机和铅字，也被叛徒熊远利（原任豫鄂边区建行鄂东分行会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出卖而被捕。经组织在外积极活动营救，同年十月底出狱后又回到襄南解放区印钞厂，专做中州市的票版工作。当时，尹竹樵为厂长，尹楠亭为工务股长，行政股长由彭斌担任（现住沔阳简家口）。这个厂有工人廿多人，小石印架子四部、元盘一部，厂里没有武装。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蒋匪在全国各大战场均遭惨败，但它们是不甘心自行灭亡的。它们竭力垂死挣扎，时时侵犯我边区，我们在熊口的钞票生产也常常因此被迫中断。当蒋匪对我发动最后一次“围剿”时，沔阳专区机关转到了新沟咀一带，钞票也随之转移到新沟咀一带秘密生产。

四、全国解放以后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月武汉解放了。

沔阳专署于六月从熊口迁到了洪湖县新堤镇——即当时

沔阳地委所在地。襄南边区印钞厂也因此全厂连人带机器全部迁到新堤。此时，襄南各县亦全部得到解放，为了统一币制，先解放的大城市已有胶皮机大量印制人民币，因此，襄南边区印钞厂结束了印钞工作的历史。襄南边区印钞厂亦改称为沔阳地区新华印刷厂，主要任务印制粮票和地委的一些文件。五一年五月端午节前，沔阳地委宣布撤消。新华印刷厂随当时的中原军区江汉军分区政委杨殿魁同志和地委负责人谢建同志迁往黄石。当时的印刷厂是乘一条五六百担的大船来黄石的。同船的有：尹竹樵、尹楠亭、王维春、尹明清、王宝才、王玉怀、王心爽、艾庭伟、艾祖松、艾德福、易勤礼、杨安澜、朱礼、程世元、熊福堂、郭志忠、陈定学、魏加春、熊少云、余光炳等同志。随船有四开印刷机两部，小石印机三部、元盘两部和一些印刷器材。

来黄石后，建厂于黄石港新街殷盛茂，厂名曰：工人报经理部。主要任务是印统一发票和市委一些文件，厂长尹竹樵由于患心脏病，加之从新堤到黄石沿途日夜操劳，在船上病发吐血、到达黄石经当时的普爱医院抢救无效病逝。尹竹樵逝世后，张志宽为工人报经理部经理。之后，尹楠亭同志任黄石市印刷厂厂长。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黄石市委机关报：工人报创刊，当时任湖北省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对新兴的工业城市黄石市非常重视，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底亲自为工人报题书报头。由尹楠亭、付仁烈同志（原黄石市工人报编辑部负责人）专程将报头从武汉取回，工人报经理部负责承印工人报。

五三年全厂职工总数（包括干部）四十二人，手摇铸字机两部，加上手摇石印机、铅印机、手拖切纸刀共十四部机

械，月总产值为六万元。随着黄石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印刷厂除承印工人报外、扩大了经营范围。许多于汉做印刷的技术工人，如：张汉生（现任副厂长）等同志陆续调到黄石市印刷厂，这样就很大程度地充实了印刷厂的技术与骨干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工人报经理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综合性印刷能力的工厂，开始了杂件、彩印和报纸的综合性印刷。

五四年，经黄石市工业局决定：工人报经理部改称为黄石市国营印刷厂。五四年夏，黄石市遭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全厂职工在市委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搬运机器，抢救国家财产，积极投入了防汛抗洪斗争，使工厂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五五年，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购置了对开电动石印机，扩大了彩印业务。当时在承印市食品厂糖果纸的过程中，没有拖腊设备，老工人唐荣生同志（副厂长，已离休）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小石印机架子，改装成了拖腊机，解决了糖果纸拖腊的一大难关。唐荣生同志亦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模群英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五六年，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黄石市印刷厂与春华印刷厂、光明印刷厂和天禄阁印刷厂合并，统称为黄石市国营印刷厂。

五八年至六〇年，这个厂是市里的先进集体，是当时全市的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同时还被评为省里的红旗单位。工人们工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平均每天工作九到十二小时，大家都是早上班晚下班，星期天也自觉地上半天义务班。

同年，市印刷厂在全市首先推行经济核算制，内部发行了经济流通卷。工人参加管理，车间设立民主管理六大员（质检、保管、政宣、核算、统计、安全），在技术革新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老工人王心爽、代中秋等同志试制成功了四K、元盘印刷机的自动化生产，摆脱了笨重的手工劳动。在印刷技术上前进了一大步，受到了黄石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视。黄石日报曾头版头条报道了印刷厂推行经济核算的经验，不少省、市、县同行业单位都来取经学习。

六六年，黄石市印刷厂承担了印制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光荣任务。黄石市印刷厂也是黄石唯一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工厂。与此同时厂房、设备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大冶钢厂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下自制对开胶印机两台，购置了配套的照相制版等先进设备，成立了胶印车间。从此，黄石印刷厂在生产工艺上第一次以先进的胶印工艺取代了使用三十余年的石印工艺，又进一步扩大了彩印业务。七七年，光荣地承担了毛选五卷的印制工作。至今，黄石市印刷已成为彩印、铅印、凸印、塑料印，拖腊等工艺同时俱备的综合性印刷厂。拥有照相制版、照排机、海德堡、日式卧飞机、双色自动胶印机等先进的印刷机械，产品行销全国许多地区，一些产品还进入国际市场，如：出口产品“养命酒纸盒”获湖北省优质印刷品奖。

黄石市印刷厂不愧为一个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老厂。职工队伍目前比五三年增加9.5倍，固定资产比六六年增加5.7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五三年增加3.8倍；利润总额比六六年增长4.7倍，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目前，这个厂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拨乱反正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正

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和振兴黄石经济将作出更大的贡献。